

郡县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

□ 周 群

郡县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地位特殊，其起源与发展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郡县制的起因来源于诸多综合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促使采邑制被废除，新型地方行政机构得以建立；县和郡最初都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逐渐由临时措施发展为固定制度，郡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各项制度变革催生了郡县制的形成。

郡县制产生的标志是春秋时期郡制出现和郡县制情况的出现，到战国时郡县制形成，秦统一后推广至全国，至两汉臻于完备。从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观点来看，郡、县在战国时代都是军区，并不是行政区，至秦统一后才真正完成行政上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在诸侯国中逐渐蔓延。楚国县的发展较早，楚武王克权后，权县的设立标志着楚国设县的开端，此后楚国通过灭国、利用旧都或别都等方式设立了多个县。但春秋楚县尚不是郡县之县，其性质经历了从封建邑向国君直属邑的过渡，县尹仍带有封建性邑主的影子。秦国在春秋时期也开始设县，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此后秦国不断拓展县的设置。在春秋初期，秦国的县可能为“县鄙”之县，后来逐渐发展为“县邑”之县。到战国时期，经过商鞅变法，县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备了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

晋国县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县的涵义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春秋早期，晋国的县多为卿大夫的采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县的性质发生变化。晋文公时期，县开始由国君直接控制，后来由于卿族势力强大，部分县又转化为卿大夫的采邑。春秋末期，晋国的县开始向郡县制演进，县的军事性质逐渐增强，行政与财政职能也不断发展。

齐国县的发展相对较晚，春秋早期和中期，县的“县鄙”之义仍广泛应用，管仲改革时提出的县制设想未得到真正施行。直到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齐国的县才逐渐发展为“县邑”之县，战国时期完成了向“郡县”之县的转变，县级政权的经济职能也逐渐显现。

春秋时期，郡的发展相对缓慢。郡最初作为国君的公邑存在，主要分布在国都周边或边境地区，为军事防御而设。《国语·晋语二》中晋公子夷吾对秦公子繁许诺的记载，以及《左传·哀公二年》赵盾之誓，都反映了春秋时期郡的存在，但此时郡的发展较为滞后，其地位和重要性不如县。进入战国时期，郡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郡由君邑的泛称变为辖县的军区，这一转变客观上源于战争规模扩大导致的分区防守需要，主观上则源于春秋末期晋国社会的变化。战国时期，郡主要承担军事职能，郡守是军事长官，郡域是军区而非政区。不过，到了战国末年，郡逐渐向政区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加速进行。

秦代确立与发展。战国时期，秦国和其他诸侯国已广泛置郡。秦国所置郡能确定者有22郡，如魏的上郡被秦吞并成为秦郡，出土兵器可佐证；韩、赵、魏的上党郡最终也为秦所有；秦惠文王置汉中郡，秦昭襄王置南郡等。其他诸侯国所置郡能确定者有21郡，如楚有新城郡、洞庭郡和苍梧郡等，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等，魏有西河郡等。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把天下划分成36郡。最早明确说出这36郡具体名字的，是裴骃写的《史记集解》。秦始皇二十六年划分的这36郡，是参考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设置的郡，对郡名和郡界都做了调整，而且大部分沿用战国时期各国的郡名。

实际上，经过后世考证，秦朝设

置的郡可不止这36个。通过各种资料推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前后出现过的郡大概有50个。不过，整个秦朝时期，郡的数量保持在36个左右。

秦代确立的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通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秦始皇将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政令的畅通。郡县制的实行，打破了以往分封制下地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统一的行政制度和政策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郡县制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以后历代王朝虽有调整 and 变化，但基本框架和原则多源于秦代的郡县制。

汉代巩固与完善。西汉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在部分地区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国。实行这一制度源于历史的惯性，有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政权，分封同姓子弟以拱卫中央；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妥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国势力逐渐膨胀，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在郡国并行制下，郡县制仍在不断发展。整个西汉时期，对郡县的设置和管理一直在进行，如汉武帝时通过推恩令等措施削弱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对郡县的控制；同时，西汉王朝还对郡县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使郡县制更加适应国家的发展需求。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研究秦汉郡县制具有重要价值。它详细记载了西汉百三郡国的历史地理沿革，为研究郡县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班固以西汉末百三郡国为起点追溯秦汉郡国沿革，有其严格的书法义例，只有理解这些义例，才能正确使用其中的史料进行研究。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的发展演变反映了中国古

代国家政治制度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政治治理智慧。

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免，直接对中央负责，这是郡县制的重要优势，这种结构打破了分封制下地方势力的独立性，有效避免地方割据，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如秦代通过郡县制，将权力集中到中央，为后世历代王朝巩固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确的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为地方治理提供规范和标准是郡县制的重要优势。秦代对县的组织进行统一规划，每县设令、丞等官职，明确职责。这种规范化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保障地方事务有序进行，也为国家对地方的考核和监督提供了便利。

不同历史时期，郡县制的发展演变均能较好地适应时代需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调整郡县设置，如楚国通过多种方式设县，秦国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县制。到秦代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实现对广袤领土的有效管理。西汉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后期又加强对郡县的控制，这些变化都体现了郡县制的适应性，使其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积极作用。

郡县制打破了以往的地域界限和血缘关系，促进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行政制度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统一制度下生活，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值，更强调通过“思与理合”实现认知突破。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思维方式既避免了泥古不化的保守倾向，又克服了空谈玄理的空虚之弊。其价值不仅在于具体科技成果，更在于构建了“继承—批判—创新”的科学发展路径。

从“术”到“道”的传承。我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认识论特征强调直观体悟，知识的存在形态可分为显性语言和隐性知识两类，前者能够用语言文字明确加以表达，后者往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必须靠领悟才能把握。在元代理学空谈性理之学的风气下，郭守敬的人格具有独特性。他受传统儒家人文理性精神影响，又结合其科学实践，可以发现不同阶段呈现出“体悟与模仿”“实践与调整”“会通与创新”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他将儒家“志于道，据于德”的人文理性转化为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以契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宏远的爱国、爱民、敬天、忠君等价值观。

与郭守敬合作共同编制《授时历》的王恂、许衡等人也都从小接受儒家教育，郭守敬的得力弟子齐履谦更是“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乐礼、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淹贯，尤精经籍”。郭守敬的后人郭伯玉、郭贵都以天文、历算造福于世，他们的家学传承也都呈现出“技术性”与“伦理道德规范”融合的特点。中国古代科技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是使科技成果变为各种具体的“术”，而郭守敬尤为重视家学中“术”与“道”的传承。

郭守敬的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内核、以现实需求为动力、以实证方法为路径、以继承中创新为思维原则、以民生改善为价值旨归的有机整体。他“因旧谋新”的革新思维、“实测求真”的治学态度、“利国利民”的价值取向，构成中国传统科学精神的典范，其中蕴含的实践品格与创新意识为后来的科学传承发展提供了可供学习的经验。



(上接1版)

大力实施能级跨越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战略支撑力。一是增强战略发展实力。谋深谋实一批100亿级、500亿级、1000亿级的标志性项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力争未来5年经济总量跨越2个万亿级台阶。二是增强战略服务功能。加快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健全“通道+枢纽+网络+平台”的现代供应链物流体系，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全面增强支点的战略牵引功能、要素集聚功能、资源配置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三是增强战略腹地支撑。积极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战略性物资储备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华中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储备基地、国家医疗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大力实施科创引领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创新策源力。一是做大做强科技力量矩阵。全面实施高能级科创平台培育工程，力争再创建1—2家国家实验室，争取将磁约束核聚变等大科学装置纳入“十五五”规划。抢先布局重大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科创平台体系。二是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滚动实施“61020”全链条攻关，着力在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科技、高端芯片等领域下功夫，加快破解关键核心技术，把“卡脖子”制约变成“卡位”优势。三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完善政产学研服用“北斗七星式”成果转化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以“71020”高校创新体系为牵引，促进人才互通、教研结合、产教协同，加快形成“大教育”“大科技”“大人才”工作格局。

大力实施产业倍增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产业竞争力。一是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汽车、钢铁、化工产业转型“三大战役”，启动实施纺织、食品、建材产业转型“新三大战役”，推动传统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深入实施数字新基建、产业新集群、应用新场景、开源新体系、融合新机制“五新工程”，加快生命科学、AI大模型、前沿材料等领域产业布局，推动未来产业布局抢滩。二是加快促进产业聚能成群。实施“链长+链主+链创”的三链机制，加快打造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母机等3个以上世界级产业集群，争创动力电池、现代化工、北斗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加快打造企业雁阵梯队。发挥领军企业作用，未来3年打造10家千亿级制造业企业、20家500亿级制造业企业、60家百亿级制造业企业。聚焦专精特新、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3个方向，力争未来3年单项冠军企业达到1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万家。

大力实施枢纽提能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开放辐射力。一是以建设陆海空“三条丝绸之路”战略枢纽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建设“轨道上的湖北”，持续提升湖北12向“超米字型”高铁网辐射通达全国效率。建设“水运上的湖北”，全面构建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核心的集疏运体系。建设“航线上的湖北”，构建“借港出海”“经鄂入境”新格局。二是以离岸在岸一体化推动新时代“九州通商”。推动湖北外贸市场扩容增量，贸易规模每年过一个千亿台阶，到2027年达到万亿规模。大力开拓离岸业务、全力做大在岸业务。抓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加快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三是以高标准制度型开放推进新时代“九州通融”。推动各级各类高新区、经开区等开放平台提能进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实施大财政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开展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打造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供应链管理中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打造全周期服务、全链条协同、全社会参与的一流发展生态。

大力实施美丽湖北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生态承载力。一是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接续实施长江大保护“双十工程”“双十行动”，打

好湖泊治理、直排口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化工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二是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调整产业、能源、运输、用地结构，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三是积极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着力开展“美丽系列”建设，建立分层级分领域示范推广机制，率先形成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山川建设示范标杆。四是拓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依托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碳登”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碳市场和碳金融中心，为全国“双碳”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大力实施文化创新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文化影响力。一是强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做好屈家岭、秦汉简牍等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阐释，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二是唱响湖北“五个一”的文旅品牌。大力实施荆楚文旅品牌提质工程，让“一幅美丽的画、一本厚重的书、一首激昂的诗、一座丰饶的园、一架通达的桥”“五个一”的文旅品牌天下皆知、世界闻名。三是持续提高文旅影响力和显示度。办好文旅展会增强活跃度，改善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满意度，大气魄大手笔讲好湖北故事，传播湖北形象。

大力实施区域联动战略，整体提升支点的区域协同力。一是强化辐射引领，更大力度做强汉宜襄“金三角”硬支撑。加强都市圈能级跃升，建立健全武汉、襄阳、宜昌“金三角”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把武汉都市圈打造成人口超过3000万、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元的世界级都市圈，推动襄十随神、宜荆荆恩城市群跨过2万亿元。二是强化县域支撑，更大力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百强县进位、千亿元扩容，打造一批经济强镇、工业重镇、文旅名镇、商贸集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三是强化协同融通，更大力度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强省际协作和交界地区合作，推动打造“科创链上的中三角”“轨道上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叠加、走深走实。

昂扬斗志、团结拼搏，强化支点建设的战略保障

加快建成支点，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加快建成支点的实际成效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

强化支点意识，凝聚团结奋进的向心力。推动各领域、各层级工作都向支点建设聚焦发力，全力以赴抓项目、抓投资、抓消费，集中精力扩内需、调结构、促转型，不断在提升发展能级、发展质效、发展后劲上当先锋、打头阵。

强化争先意识，提振勇创一流的精气神。大力弘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择高而立、向上而行，敢与好的比、敢与快的赛、敢与强的竞高低，位居第一不止步、位居第一不罢休。

强化效率意识，保持雷厉风行的快节奏。树牢“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时间观念，大力发扬“雨天当做晴天干、两天当做一天干”的快干实干作风，谋定快动、紧抓快干，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上台阶。

强化为民意识，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效。推动政策向民生聚焦、财力向民生倾斜、服务向民生覆盖，用心用情解决好就业增收、“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化能力意识，练就善作善成的硬本领。在全省开展“干部素质提升年”活动，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学习提能、实践强能，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锻造一支堪当支点建设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郭守敬的科学精神与理

郭守敬的科学精神

□ 张茂泽

敬的学术根基始于家学传承与紫金山学派的淬炼。其祖父郭荣精于算数、水利的启蒙教育，与刘秉忠、张文谦等师友以人本为治学理念相融合。郭守敬在邢州治水时的初试锋芒，不仅展现其“观天察地”的实证能力，更践行了元好问“择可劳而劳，因所利而利”的治世哲学。这种早期实践将儒家伦理具象化为家国情怀的行动准则，为其毕生追求确立了价值坐标。

在宁夏平原的渠系改造中，郭守敬创造性地提出“因旧谋新”的治理范式：通过系统考察唐徕、汉延古渠的现状，采用“旧渠为体、新技为用”的改良策略——保留原有渠网以“节用”民力，辅以滚水坝、调控闸等技术创新，仅用半年时间便重构河套水利体系。这种“传承中创新”的智慧在他主持的通惠河工程中更臻完善：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与漕运压力，他首创“预案先行一分步实施”的工程模式，先以精密勘测建立数学模型，再通过砖石闸技术突破木闸局限，历经20载终成“船舶蔽水”之盛景。两大工程遥相呼应，彰显其“实证为本”的科学精神与“民本为要”的价值追求。

郭守敬的工程哲学始终贯穿辩证统一的技术伦理。在方法论层面，“节用”原则体现为对既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邢州石桥修复中的就地取材、渠系改造中的旧基利用、通惠河工程中的木闸革新，无不渗透着成本控制与技术创新相平衡的智慧。在价值维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利国爱民”的济世情怀互为表里：从精确到寸的河道勘测，到以“昼夜通航”为目标的闸门设计，技术细节的极致追求始终服务于改善民生、巩固国本的终极目标，使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超越了工具理性层面。

科学创新与理论突破。郭守敬的科学成就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前人在对他的科学精神进行分析时，都认为“因旧谋新”“继承与创新”是他开展科技活动的前提，是他科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但对郭守敬“因旧谋新”理念的研究多止步于经验层面，事实上，这一思想蕴含着从工匠思维向科学思维的范式跃迁。在改良天文仪器过程中，郭守敬发现水利工程“因旧谋新”方法论与天文、数学的认

知共通性。以郭守敬改进创新的简仪为例，它是在传统浑仪的基础上集合“简仪”“候极仪”“立运仪”三者的优势，简化创新而成的新型天文观测仪器。既保持中国传统观测体系，又吸收阿拉伯象限仪技术，制成观测精度达1/12度的仰仪。这种“形器承古，数理维新”的创造路径，呈现了中国传统科学研究理念的创新发展。

在数学方法革新中，郭守敬以实证精神突破传统桎梏。郭守敬关注到“时差”问题。他借助元朝广阔疆域的地理优势，组织了“四海测验”，选取了南北27个测验点，着力解决各地“日月食分秒，时刻不同”问题。通过组织横跨27个观测点的“四海测验”，其纬度测量平均误差仅0.2°—0.35°，其中两处与现代测绘值完全吻合。这种以实测数据将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熔铸为有机整体的有效实践，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达到方法论自觉的新高度，标志着中国传统历法进入实证科学新阶段。在这一时期，郭守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他认为：“前代诸人为法略备。苟能精思密索，心与理会；则前人述作之外，未必无所增益。”

在批判中继承的思维是从历史发展角度对古今、新旧关系的整体把握，已然体现了科学精神。《授时历》工作的具体开展是从天文仪器的改良和数学方法入手的。在对数学方法的整理和应用上，郭守敬的科学思维也体现了其科学精神。在编制《授时历》时，他发现上元积年法不仅繁琐，而且后人往往进行人为附会更改，力求在视觉上达到“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连珠然”的效果。郭守敬认为“后人厌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断截其数而增损日法，以得为改宽之术，此方积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者也”。郭守敬循着怀疑求证的科学路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打破了上元积年法作为“学术公论”的形象，以更为便捷、简要的实测历元法作为替换，从此结束了推求上元积年的历元制度，这是我国历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郭守敬在《授时历》编纂中形成的“精思密索，心与理会”方法论，构建了独特的科研理念。他既肯定“前代诸人为法略备”的知识积累价